

招待费很敏感本来就很悲哀

【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】

有些不正常的事情,在现实中却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,往往有两种情形。一是我们已经麻木了追问的神经——就是你追问,也问不出结果来。久而久之,追问的动力没了,追问权也渐渐地放弃了。第二种情形是,追问本身就是罪过,是一种禁忌,你连问都不能问,这“不正常”便成了“正常”。不知道“政府招待费”属于哪一种。

11月17日的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沈阳市民温洪祥向政府招待费“发难”的新闻:温洪祥向财政局、审计局和政务公开等部门递交申请,要求沈阳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县(市)政府公开办公费、招待费、差旅费、单位事业性经营收入等财

务账目。但沈阳市政务公开相关负责人却说:“由于国内还没有先例,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,难度极大。”

“政府招待费”有多敏感? 温洪祥指出的是,温洪祥“追问”的政府公开信息有好几种,媒体却多拿“招待费”做题,可见招待费确实是个极其引人注目的话题。

政府财务信息,笼统地说,确实敏感。确实有许多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秘密,但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以温洪祥所追问的“政府办公费”、“招待费”、“差旅费”等财务账目来看,恐怕就谈不上什么“机密”。说“敏感”倒不为过,因为这些事情,是老百姓想知而不得的,一旦让老百姓知道了内情,恐怕有些“不

方便”,甚至“气不过”。我们勒紧裤腰带缴税,却让某些“公仆”们花天酒地,是个人心里都不平衡。因此,为了不失控,这些信息当然不能外泄。

以招待费为例,如果让老百姓都知道,市长书记陪人家吃了什么,“政治”岂不是家常化了? 因此,尽管包括“我”在内的老百姓,一直都很想知道官员们是怎么吃,怎么喝,怎么花的,但总不好意思问:别问出什么来,还被人家呵斥“一边呆着去”。

尽管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矩来约束“招待费”,但总是左手管右手,政府招待费总能找到突破口。用一个诗人的话来说,如果有关“招待费”的规定有一万种,那么,告诉你,有关部门总能找到“突破封锁”的

第一万零一种方法。所以,政府招待费总要不断膨胀,为拉动消费做出卓越贡献。至于到底贡献了多少个百分点,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情,我们老百姓,最关心的是,你们到底吃了多少? 你们到底能吃多少? 这算是“机密”吗?

当然,托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之所赐,我们也知道,一个透明的政府,有许多事情,是应该主动向百姓交代清楚的,这其中不包括招待费,待考。令人沮丧的是,在外国元首因多吃一道菜可能被迫向国人道歉的时候,我们还在为“政府招待费”是不是机密、能不能脱敏而争论不休,不知道,这是国情不同,还是差距太大?

(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)

公开招待费,难度真的还很大

■相关评论

我细细一想,觉得公开办负责人“公开招待费难度极大”的表态并非虚言,自有其“道理”。

首先,如果相关部门对温洪祥的申请置之不理,温洪祥又该如何? 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,温“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、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。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。”但经验告诉我们,这种举报通常不会有什么结

果,因为招待费中的很大一部分,说不定正是被用来招待这些机关中人,共同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“调查处理”很可能不会了之。倘若真的“严肃”起来了,难道下次来沈阳竟吃路边小店不成?

当然,《条例》还赋予了温洪祥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,但冗长的诉讼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,很可能会让温洪祥望而却步,况且,《条例》本身对司法救济途径也没有很好解决。今年5月1日《条例》开始生效后,各地纷纷出现了“政府信息

公开第一案”,这些案子闹嚷了一阵之后大都无疾而终,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其次,退一步说,即使是这些部门愿意公开这些财务账目,谁又能保证公开的就是真实的? 我敢讲,假如沈阳市相关部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公开账目的话,那么这个账目肯定也是完全符合规定的。道理很简单,还有多少部门没有自己的小金库? 更何况,在许多情况下,招待客人,吃喝玩乐的花销,自有明白的企业主动买单,这些开支当然也

都是不会入账的。

但温洪祥的努力,却仍然很有意义。他提醒大家,我们有权知道官员们花了纳税多少钱,公众有权向官员提问,而官员也有义务回答公众。此外,此事“难度极大”也提醒我们,建设一个透明的政府,很难毕其功于一役,即便有了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,也需要人大真正负起监督、问责的责任,需要媒体和公众行使监督权。可以说,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出台,不是建设透明政府努力的结束,而仅仅只是开始。(邬凤英)

松绑“个人放贷”没有想象中可怕

■热点纵论

今后,个人有望合法注册从事放贷业务。由央行起草的《放贷人条例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,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。

(11月17日《京华时报》) 提起放贷人,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将其等同于唯利是图、作恶多端的放高利贷者。其实有效监管下的个人放贷不仅没那么可怕,还能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。

在我国,银行几乎是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。这样的金融行业垄断格局,

不仅造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,而且使大量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获利的合理出口。通过立法使民间放贷合法化,是解决地下钱庄等引发金融风险的有效方式,也是公民获得财产性、资本性收入的一种途径。

在当前情况下,个人放贷解禁还将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向好。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导向性的。经济的好转关键还要看企业的经营状况,作为经济润滑剂的信贷支持意义重大。个人放贷的合法化将丰富信贷市场的主体,填补中小企业和低风险项目所面临的空白。(周东飞)

我怀疑周老虎认罪,但我没办法了

■热点纵论

虎照案二审开庭,本来坚称被冤枉的周正龙突然改口称假虎照是其一人为,并请求宽大处理。一个疑问重重的事,就这么画上句号了。

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官员暗中长舒一口气,舆论压力解除了,没有人再来追究他们撒的弥天大谎了。周正龙缓刑三年的刑罚换来了陕西官场的一片宁静,代价虽然比预期的大,但仍不失为一笔合算的交易。

周正龙的认罪很可疑,他人是否有能力造假也很可疑,但一切都只

能可疑,而舆论无力再深究。再深究下去就是这样的问题:是否相信司法公正。我们只能相信司法公正,所以,虎照事件的句号,就这么给画上了。

以民众的司法信仰来平息一个舆论事件,表现出抄了捷径的小聪明。但黑幕总归要大白于天下,周正龙可能要坐牢,但出狱后,他还是一个浑身藏着无数秘密的新闻人物,这个早就知道如何收取媒体采访费的人,他能守口如瓶多久? 或许将来某一天,我们会从周正龙回忆录中看到,为了画上一个像样的句号,一些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,又是如何在越来越不惜代价中走上一条不归路。(范大中)

推行乡村养老保险是多赢之举

■公民发言

人保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说,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中,会安排部分中央财政用于农民养老保险。(11月17日《新京报》)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。据预测,20年后,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比城镇高出2~6个百分点,届时,一对农村夫妇将要供养4~6名老人,其赡养负担明显

过重。此外,由于农村人口流动加快,子女必须赡养老人的道德约束力也明显弱化,严重动摇了“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”的选择。大力发展农民养老保险,有利于解除农民后顾之忧。而且,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,目标是让每个公民都享有社保体系的保护,而不能把农村人口排除在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。现在,政府终于开始关注农民养老保险了,这让人很欣慰。(张兰英)

娱者千虑

谁让郭德纲成为第二个张斌

正所谓猛料年年有,今朝特别多,明星们的私房事儿越来越多地飞进寻常百姓家,“爆料者”俨然成了明星大腕贴近观众、拉近与老百姓距离的强有力的纽带。

但很遗憾,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啥都有就是无德,经常通过给知名度高的明星扣屎盆子这种缺德的假新闻来制造噱头,炒作某些急于成名又不想走正道的小明星,进而赚取不菲的报酬。如张斌被曝新婚外情,“第三者”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。由于这种不道德交易投入小、见效快、收益高,遂成为娱乐

市场新宠。据说,仅京城就有近10家这样的炒作策划团队,娱记们的邮箱也常能收到类似“猛料”,至于故意投放在网上爆料的则更多了。先弄个负面的轰动新闻,大多拿明星丑闻、绯闻说事,有的甚至恶作剧编造明星之死的“噩耗”,随后再由明星或经纪人、制片人出来否认、澄清,由此提高关注度和曝光率,这似乎成了炒作者们一种常规手法。

如今百度一下“张斌新婚外情”,能找到相关网页约85万篇,这是多么高的曝光率,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女歌手原梓菲一夜成名。有消息称,原梓菲目

前的商业演出身价开始猛增。正如这一假新闻的策划人所说:“一个事件失败与否,要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跟我们的策划目的吻合。原梓菲从一个无名新人突然变成了媒体追踪报道的热门人物,而且在商演上暴涨了身价,这就是我们最初要达到的目的。”

如今郭德纲先生“非常幸运”地成为第二个张斌,同样是与一位不知名的女歌手纠缠不清,这不仅让人感慨当年那些靠一首歌走红大江南北、到祖国各地混吃混唱的歌星是多么的幸福,现在唱歌的想出

看来只能靠这些下三滥的策划来实现了。

尽管猛料对于媒体就像骨头对于狗,而且猛料确实能带来效应和效益,但人都是憎恨被欺骗的,这年头谁也不比谁傻多少。“狼来了”这种伎俩一次两次很管用,但用多了人们也就识破了,一摆屁股就知道要拉什么屎,而且这种缺德事儿也触犯法律,搞不好哪天赶上严打就要吃官司,赚的黑心钱也没时间享用,所以奉劝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娱乐策划者们:赚钱虽好,可不要昧着良心呦! 白波

就事论世

双面伊人

摇滚明星涉黑被抓后,有个报纸的专题报道颇具才情地用了这样的标题:“双面伊人”。凝视这个标题三秒钟,冲动我所有的语文常识和生活储备,确认编者有调侃之意后,我才敢笑出声来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双面伊人”,A面是黑,B面是白,A面是现实,B面是梦想,A面是受气包大英雄,B面是万能的机器猫,A面是忍辱且不负重的小人物,B面是玩转地球的大英雄,A面是白天活在剃刀边缘的小职员,B面是夜晚里骄傲的巨人。但,既然是想象中的形象,何不只想像作为英雄、巨人的那一面? 那样就没有先抑后扬的巨大快感了。A和B,缺一不可,A是底板,B是PS后的美图,A供普通人将自己代入,B则提供代入后的狂野驰骋。

《超人》《蝙蝠侠》《蜘蛛侠》都是“双面伊人”领域的代表作品,白天是小职员,夜

晚内裤外穿之后,立刻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。其实从故事的结构来说,小职员的身份设定,完全没有必要,但从意淫的需要出发,他们必须有个个储备,确认编者有调侃之意后,我才敢笑出声来。

中国的“双面伊人”,多半存在于武侠小说里,金庸小说中的女主人公,通常都隐藏着了自己的优势,扮作丑女或者乞丐出场——先抑为的就是后扬。而“双面伊人”最集中的要数古龙小说,贤良的女子,往往是神秘的地下社团的领袖,无邪的孤女,常常身负可怕的重任。武侠小说之外的“双面伊人”,曾大规模地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反特电影里,但像《黑三角》里的特务大妈(网友说,电影上映后,曾令校门门口卖冰棍的大妈生意一落千丈)之类,终究成不了主流,因为实在不能满足群众意淫人生的需要。 韩松落

财子佳言

农民怎样变成商人

一次酒桌上,一位老板向我们讲了这么一则故事。

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,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,忽然有一天,后山上不知从哪窜出来一大群猴子,经常下山来糟蹋粮食,而且这群猴子繁衍得很快,一年之后就有数百只之多了。

就在村民们为怎么处置这些猴子烦恼时,一个商人带着他的助手来到了这里,告诉村民们,他们需要这些活猴,愿以每只100块钱的价格收购。

村民们看到了发财的曙光,全家老小出动,一天下来,每户人家都能捕个七八只。这种速度赚钱真是八辈子都没有的事情,很多村民半夜睡觉都在笑。

很快,山上猴子的数量越来越少,商人不得不把价钱提升,一直提到每只500块钱。村民们开始昼夜不眠地上山捕捉猴子,可基本上没什么收获。

这天,商人要到山外去办

事,便把收购猴子的事情交给了助手。等商人走后,助手找到村民,说他看不惯商人的很多做法,在商人手下是干不下去了,他想起已收购的猴子以每只300元的价格卖给村民们,然后村民们再以500元的价格卖给商人,这样大家都能赚一大笔。

村民们把一生的积蓄都拿了回来,争相购买猴子。

第二天,助手消失了,商人也没有再出现过。

这个老板的故事讲完了,他笑着问我们,如果我们是那些村民,会怎么办?

当然找他们去!告诉他们去!大家都这么回答。

这个老板笑笑说,可那些村民不是这么做的,他们偷偷把猴子放到另一个很遥远很偏僻的山村附近。后来,这些村民也变成了商人。

我忽然想起来,听说这个老板的家乡在一个很遥远很偏僻的山村。 朱宗成

讽骨余韵

文人为什么拍马有术

中国的文人自小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,所以长大后热衷政治,追求功名,胸怀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远大志向。一旦走上仕途,特别是有机会成为皇帝的近臣时,往往急不可待地要建功立业,“兼济天下”。

大诗人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,世袭康乐公。刘义隆当上刘宋王朝的皇帝后,很欣赏谢灵运的才华,就让谢灵运做侍中。谢灵运便自我感觉良好,觉得自己既有才,又出身士族名家,理应参与机要政务,而刘义隆只在侍宴时才与谢灵运谈论义理文理,并不让谢灵运治国理政。谢灵运于是心中十分郁闷,便以托病告假和游娱宴乐相对抗,结果屡遭御史弹劾,最后被刘义隆下诏斩首。

清朝乾隆的侍读学士纪晓岚,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,屡次就国家大事向乾隆进谏,不料竟遭乾隆训斥:“朕看你文学尚优,所以让你管领四库全书馆,其实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,你怎么敢妄谈国家大事!”

真是一语中的呀! 原来帝王们并不太把文人们当一回事,而是要他们像戏子那样捧场面,解解闷儿,唱唱赞歌……所以,当有文人不明就里要“当家庭政”“参政议政”时,大多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,自讨个没趣,有的甚至一不小心,忤逆旨意,惨遭杀戮。

于是乎,无法“当家庭政”“参政议政”的文人们,便接受皇帝们对自己的定位,把聪明才智用于拍马上,将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转化为确保自个儿富贵荣华的实践上。这样一来,

富有才气、富有创意、富有“生机”的拍马便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,一大“亮点”。东晋元兴二年(403年)12月,权臣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,自立为帝。但当他临登御座,龙椅突然微陷,朝臣们惊愕失措,侍中殷仲文反应颇快,忙说:“陛下圣德深厚,地不能载也。”面对如此恰到好处的、有板有眼的一流“拍”术,桓玄除了“大悦”,还能怎样? 朱元璋有一次外出钓鱼,无奈鱼不上钩,朱元璋心情很是不爽,翰林大学士解缙适时献诗曰:“数尺丝纶落水中,金钩抛去永无踪;凡鱼不敢朝天子,万岁君王只钓龙。”面对如此气势磅礴、化腐朽为神奇的“拍”功,朱元璋不龙颜大悦才怪呢。乾隆皇帝50岁生日时,纪晓岚趁机奉上对:“四万里皇图,伊古以来,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;五十年圣寿,自今而后,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。”这样的贺联确实“震古烁今”,足见纪晓岚的拍马手段已臻化境,神出鬼没。

如果说上述的种种拍马是文人们玩的文字游戏,属于技巧型,那么另有一种拍马就是颠倒是非,指鹿为马,没心没肺了,譬如康永韶的“以灾为祥”之拍。据《明史·列传第六十八》记载,明宪宗时,陕西发生大饥荒,死了很多人,太常少卿、钦天监正康永韶上书明宪宗说:“今春星变当有大咎,赖秦民饥死,足当之,诚国家无疆福。”把灾难当成可喜可贺的事情来上报,虽然把坏事“唱”成了好事,并“唱”得皇帝“甚悦”,但这样的“唱”拍已经完全是一种变态了。

孙存准